

新体系 的黎明





一位著名贸易经济学家担心，全球贸易体系面临着退化成一系列区域贸易协定的危险

贾格迪什·巴格瓦蒂

1995年，在经历了八年的多边贸易谈判之后，乌拉圭回合谈判圆满结束，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此时，欣喜最终淹没了沮丧。政治企图一次次以失败告终，决议的通过成为庆祝的真正原因。GATT是一个为解决贸易问题而达成的临时性关税削减协议，并不是许多人所期待的国际性贸易组织，且始终也未能成为布雷顿森林体系所设计的国际上层建筑的“第三”机构。WTO的诞生填补了这一空白。

以贸易自由化为基石的战后多边贸易体系在创造经济繁荣，进而在全球减贫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原因是，经济增长在提高贫困线以下人群收入的同时，也为有助于穷人的医疗和教育等社会性开支带来了收益（Bhagwati 和 Panagariya, 2013 年）。经过长期的讨论，贸易与发展以及经济增长与减贫之间的关系，目前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同。

但是，多哈回合多边贸易谈判未能在 2011 年 11 月的最后期限以前完成；另外，同时出现的双边和区域贸易谈判已成为美国和欧盟等大型经济体的首选，这给多边贸易体系的未来蒙上了一层阴影。在 1989 年的达沃斯会议上，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前任院长莱斯特·瑟罗（Lester Thurow）有一句似乎过于夸张的论断：“GATT 已经死去”。如今的问题或许是，“WTO 是否也已经死去？”

既然贸易自由化行动已经从多边贸易谈判转变为双边和地区性特惠贸易协定，那么摆在面前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还能够重振 WTO 的地位。世界贸易体系已步入多事之秋，未来前景将会怎样？我们该如何更好地应对当前的形势？

多哈回合谈判中发生了什么？

多哈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于 2001 年在卡塔尔首都启动，旨在通过降低关税等贸易壁垒和改进贸易规则，实现国际贸易体系的重大变革。发达经济体将其视作对抵制国际经济秩序（包括战后贸易自由化）的经济体的一种回应。另一方面，发展中经济体坚持认为，在 GATT 贸易谈判中，他们的利益曾经被忽视；而在本次所谓多哈发展议程中，他们发誓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再次上演。

事实上，GATT 意在通过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设置有利于（而非不利于）发展中经济体的规则。发展中经济体享有全部关税减让的自动扩展，而不必提供互惠贸易减让。其结果造成，发展中经济体的制造业平均关税高于发达经济体，这与普遍认为的世界贸易体系对发展中国家不公、不利的观点恰恰相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事实上，发达经济体对自身感兴趣的产品设定的关税普遍较低，而对发展中经济体传统出口商品设定的关税较高，这是由于发展中国家享有“非互惠”优待所致。尽管援助通常没有回报，但大多数国家都坚持互惠贸易减让原则。因此，发达经济体针对不需要或不期望实现互惠的发展中经济体，就面临着贸易减让的自动扩展问题。为“解决”这个问题，他们采用了产品选择倾向原则：仅对自身感兴趣的产品降低关税。如果发展中经济体也能作出互惠减让，那么这种产品选择倾向基本上就消失了。

行驶在美国加州达格特附近的货运列车。



尽管存在这种产品选择倾向，但发展中国家仍受益于发达经济体所推行的贸易自由化。随着发达经济体自由化进程的推进和经济的不断繁荣，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市场也得到了发展壮大。自二战到 1986 年期间，经历了七轮多边贸易谈判，发达经济体贸易自由化促进了市场的成长，也帮助了那些采取因势利导措施的发展中国家。韩国等一些推行外向型经济的东亚国家成功开发了发展中的海外市场，使出口和收入的增速得到显著提高，进而使贫困人口大大减少。而印度等国未能做到这一点。这一对比表明，贸易为各国提供了获利契机，但必须要紧紧抓住机遇。之所以错失良机，通常根源就在于造成国外市场获利低于国内市场的自给自足型经济政策。

然而，最终阻止多哈回合谈判在 2011 年结束的并不只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一定程度上，通过谈判作出让步（所谓“温和的多哈回合”）令美国商业游说团体无法接受。他们认为，印度（农业）和巴西（制造业）这些较为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应当做出更多的让步。他们关于目前利益还不足以让美国接受的辩论在华盛顿取得了成功。很多人认为，这是一种短视的观点。



不管怎样，较小的、政治上可行的调整（比如，处于对抗状态的美国和印度在农业领域彼此做出让步），就可以取得多哈回合谈判的成功以及一系列重大突破（包括一项终结农产品出口补贴的协定）。事实上，有许多国家首脑敦促过美国总统奥巴马以这种方式解决多哈回合谈判问题，其中包括澳大利亚总理朱莉娅·吉拉德、英国首相大卫·卡梅伦以及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2010年，卡梅伦和默克尔甚至还委派一支由本人和WTO第一任总干事彼得·萨瑟兰担任联合主席的专家小组来研究这一问题）。但结果都是无功而返。

如果问及奥巴马为何在多哈回合谈判中无所作为，是因为他不愿面对美国的商业游说团体，后者坚持要求较大的发展中经济体进一步做出重大让步，并要求实现所谓“激烈的多哈回合”。但这是不切实际的，而且需要认真进行新的谈判。最后，这些要求未能得到满足，多哈回合谈判也就未能在2011年完成。

多哈回合谈判将何去何从？

我们面临两种选择。如果我们将多哈回合谈判视

作已死，这将使很多国家政府感到沮丧，他们通过谈判取得的微小利益将消失殆尽。这无疑意味着未来所有多边贸易谈判将会终结，并注定会对WTO造成破坏。或者，我们可以在今年12月举行的巴厘岛部长级会议上解决多哈回合谈判遗留议题（《金融与发展》将于会议前夕付印），达成最低限度的协定，比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3年）深入研究过的贸易便利化协定。与“温和的多哈回合”和“激烈的多哈回合”相比，我将其称之为“温和、适度的多哈回合”。最后这个选择并不那么令人兴奋，但却更适合那些希望将WTO和多边贸易体系受破坏程度降至最低的人。

若想知道任何新型多边贸易谈判希望破灭将会带来怎样的危害，需要将WTO视作一个三条腿的凳子。第一条腿是多边贸易谈判，多哈回合谈判是WTO举办的第一轮多边贸易谈判，而在GATT框架下相继举办过七轮多边贸易谈判。第二条腿是规则制定，如设定反倾销及补贴规则。第三条腿是争端解决机制，这是1995年终结乌拉圭回合所达成的协定最显著的成果，该机制用于解决成员国政府间的争端。

摆在我面前的问题是，“多边贸易谈判”这条腿变弱（如果多哈回合谈判彻底失败，甚至可以说是这条腿发生骨折）将对另外两条腿造成多大的影响。如果是这样，则在多边贸易谈判过程中时常用到的“规则制定”这条腿就会站立不稳，或者说发生重心偏移。如果解决争端的途径是其他双边和地区性论坛，而不是WTO，那么争端解决机制也将被削弱。

多哈回合谈判未能完成，多边贸易受破坏程度却在一股强大推力作用下进一步加剧，这股强大推力由美国（其倡导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欧盟（其倡导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发起，并向歧视性的特惠“区域”贸易倡议发展。由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和秘鲁组成的太平洋联盟影响力则远不及其他两个组织。

跨越太平洋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现已进入第19轮谈判，并拥有12个成员。本质上讲，这是一项在美国领导下的倡议，其贸易份额占全球的30%—40%。大约在世纪之交，美国绕开更具活力的东亚地区，选择与南美地区开展区域贸易。东亚国家被排除在拟议中的美洲自由贸易协定之外，因此，亚洲地区的贸易倡议也有意将美国排除在外。

美国因而寻求一种方式恢复与东亚的贸易。对新西兰、新加坡和越南这样的小国而言，美国是他们制衡中国在东亚和南亚外交政策的砝码，这一理念为美国重建其在该地区的存在提供了机会。TPP的动力似

乎来自商业上的动机，而并非来自遏制中国的言论。

然而，美国游说团体提出了各种与贸易自由化几乎不相关的要求来进行干预，他们将利己主义需求描绘成“21世纪贸易协定”的基础。怎么会有人反对“新型的”、“高水平的”贸易协定呢？比方说，即使当今美国加入工会的劳动者仅占11%，但游说者仍试图将

识别到防止文化趋同（文化趋同通常伴随着美国的影响）的必要性。合理的反应应当是准许文化例外，但要坚持通过补贴而不是进口配额来实现。给雷诺阿提供补贴，但是要让他去和斯皮尔伯格竞争。将法国电影业保护起来，使其免于竞争，会助长他们享受“垄断租金”和悠闲生活的思想，这是一条完全错误的道路。



双边或地区性论坛的争端解决必须容许来自WTO非成员国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

工会的要求纳入其中。纳入这些要求的企图在WTO中遇到巴西和印度等一些有影响力的民主国家的抵制。尽管保护知识产权的要求已被纳入1995年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见本期《金融与发展》“智力贸易”），但据说TPP所寻求的WTO保护大大超出对WTO成员国现有的保护范围。

如果仍然把接受这些要求作为加入TPP的一项先决条件，那么可以肯定的是这种伙伴关系将会把亚洲肢解成TPP国家、中国和印度三个部分。此举并非上策。正确的策略应该是，允许推行自由贸易的国家加入TPP，并且不附带与贸易无关的附加条件，不附带不可取的WTO要求。接受这些要求不应作为加入TPP的先决条件。可以说：如果我想加入高尔夫球俱乐部，那么我得打高尔夫球，但我不必非得和其他俱乐部成员一起去教堂唱圣歌。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是由美国总统奥巴马、欧洲理事会主席赫尔曼·范龙佩、欧盟委员会主席若泽·曼努埃尔·巴罗佐于2013年6月提议启动的一个贸易协定，目前美国和欧盟正在就此事进行磋商。TTIP所面临的问题与TPP截然不同。首先，两个市场都很庞大，但TPP实质上是要将亚洲小国纳入进来，随后再纳入日本和韩国等较大的国家。与TPP不同，美国的游说团体对欧盟的影响很小。甚至，欧盟内部在众多问题上也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从而会减缓谈判的进程。

我们来看几个重要的例子：

文化例外：法国希望搞文化例外。美国始终不赞同这种想法，并将其视作伪装拙劣的贸易保护要求。但事实上，不仅是法国，有近50个国家的文化部长认

转基因食品：在这方面主要的意见分歧仍然是，许多美国人认为这项技术是在解决问题，而欧洲人往往认为这是在制造问题。在我的《为全球化辩护》（In Defense of Globalization）一书中有一幅漫画，展示了一个美国顾客让服务员把没有味道的西兰花拿走去做转基因。不幸的是，批评者将转基因食品称为“毁灭创造者的食品”——尽管世界卫生组织得出的结论是，这些食品并不会对人类健康造成不利影响（WHO, 2010年）——他们的反对之声对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形成了一种威胁，其中不乏很多饱受饥饿之困的穷国。对这种并不确定的“毁灭”产生的恐惧正在让人们感觉到明确的死亡预兆。

托宾税：法国正在坚定不移地实施这一货币交易税种（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托宾提出，旨在减少资本流动的波动性），而英国和美国历来对其持反对态度。在法国，很多人也仅将其视作提高收入的一种方法。另一些人则认为，银行似乎会获得救助，而穷人却得不到偿债基金上的帮助。因此，对银行资本流动交易征收重税对底层民众而言似乎非常公平，也是一种意外惊喜。很难预料TTIP是否会以某种方式迅速和解，即便真的和解，也会有不同的国家赞成或反对这一税收政策。

未来的挑战

贸易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特惠贸易协定是世界贸易体系的一个毒瘤。增长迅猛的中间产品贸易——即所谓的价值链——这是一个误导性术语，因为形成最终产品的中间产品去往不同方向并可能又折回原地：法国可能从日本进口钢材，但日本的钢厂使用的中间产品来自世界各地，其中就包括法国，这个问题困扰着每个中间产品进口商——需要有协调一致的规则，

而这些规则无法通过双边和地区性协定实现（见本期《金融与发展》“附加价值”）。

实际上，即将离任的 WTO 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同前任总干事萨瑟兰一样，对特惠贸易协定的扩散进行过公开谴责。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华盛顿的领导人——多边主义的长期捍卫者——已几乎完全将重心转向了特惠贸易倡议。

但经济决策无疑是一种次优理论的运用。目前，在双边，特别是大区域协定正在形成的局势下，新上任的 WTO 总干事罗伯托·阿泽维多应该扮演何种角色？我建议，在多边贸易谈判这条腿几近骨折的情况下，必须确保另外两条腿（规则制定和争端解决）免遭伤害。阿泽维多必须告诫 TPP 和 TTIP 的首脑借鉴从多边层面获得的经验教训，来实现这些区域协定的规则制定和争端解决。规则制定不应仅局限在这些论坛，也不应以美国游说团体清楚什么最符合大众利益为借口，排斥那些非本区域协定成员的国家和地区。同样，双边或地区性论坛的争端解决必须容许来自 WTO 非成

员国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

这些任务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但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多边贸易谈判可能已经消亡，特惠协定成为唯一的选择，如果阿泽维多不将这些任务作为当务之急来抓，WTO 的领导地位还将继续遭到侵蚀。到时候，那将成为一种遗憾。■

贾格迪什·巴格瓦蒂 (Jagdish Bhagwati) 是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法学及国际关系学教授，并兼任外交关系委员会国际经济问题高级研究员。

参考文献：

Bhagwati, Jagdish, and Arvind Panagariya, 2010, "Wanted: Jubilee 2010: Dismantling Protection," *OECD Observer*.

———, 2013, *Why Growth Matters: How Economic Growth in India Reduced Poverty and the Lessons for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2010, "20 Questions on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s" (Geneva).

IMF 最新出版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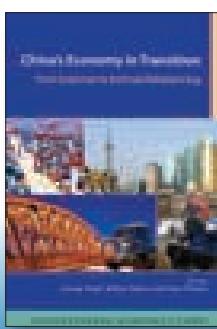


中国提高金融稳定性的道路 一些政策观点

Udaibir Das、Jonathan Fiechter、Tao Sun (编)

本书关注中国当前所面临的主要的金融政策问题。参考中国当局高层及中国院校、IMF 的工作人员的研究，本书探讨了中国的金融政策背景、影响金融稳定性的宏观经济因素以及金融体系监管的重要作用。本书意在理解进行中的金融部门政策过程以及中国经济首要任务中出现的改变。

© 2013, 242 页, 平装, ISBN: 978-1-61635-406-0 Stock# CRGFEA, 定价: 38 美元



中国经济转型 从外部再平衡转向内部再平衡

Anoop Singh、Malhar Nabar、Papa N'Diaye (编)

本书从多角度探讨了中国当前的再平衡问题。重点关注三个主题：中国经常项目减少的原因以及国内不平衡增长的迹象；对中国贸易伙伴的影响；从中国增长模式（以达到稳定的、可持续的、更具包容性的改革）获得的政策经验与教训。

© 2013, 292 页, 平装, ISBN: 978-1-48430-393-1 Stock# CETEDEA, 定价: 30 美元

请访问 eLibrary.inf.org/page/free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